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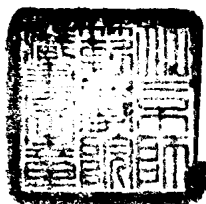
小说追踪

刘思谦 孔凡青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小说追踪

刘思谦 孔凡青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60594

1060594

责任编辑：李文禄
晓 蓉

小说追踪 刘思谦 孔凡青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西路三段四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第六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184千字

印张：8 $\frac{3}{16}$ 印数：1——3500册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429·016

定价：1.50元

目 录

1979年短篇小说漫话.....	1
生活的波流.....	6
“开拓者”家族.....	17
追寻探索者的足迹.....	27
文学追赶青年的轨迹.....	35
旧梦与新岸的辩证法	
——关于知青小说的回顾与思考.....	50
通向心灵的路.....	61
他们和新中国同命运	
——当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	75
1984年中篇小说一瞥.....	86
小说创作中的悲剧观念.....	95
“西部小说”两题.....	114
谈中篇小说情节结构形态之演变.....	127
谈刘心武的小说创作.....	139
蒋子龙的小说创作.....	152

张一弓创作论·····	172
叶文玲“小溪风格”之得失与流变·····	191
读《啊!》断想·····	208
优美动人的知识分子形象	
——湛容和她的《人到中年》·····	215
大地之子	
——王蒙和他的中篇小说《蝴蝶》·····	222
古老的草原上响起理想之歌	
——张承志和他的《黑骏马》·····	231
多样化——小说发展的大趋势·····	238
文学寻“根”之我见·····	245
新闻化的小说，小说化的新闻·····	251
后记·····	258

1979年短篇小说漫话

一九七九年短篇小说出现了许多受群众欢迎的好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了新的突破。

我想先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文学》七月号）谈起。这篇小说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有的工人说：“我们的工厂就是小说所描写的那么一种状况，要是乔光朴能到我们厂来上任就好了”。有的读者说：“乔光朴有魄力、有才干，可惜这样的干部太少了”。时代需要千千万万个乔光朴。读者对《乔厂长上任记》的热情赞扬，说明这篇小说及时而又准确地反映了新时期的社会现实，表达了人民的心声。作者在塑造这个人物时十分注意如实地反映当前复杂的思想 and 人事的矛盾纠葛，大胆揭露一切阻碍四化建设的障碍，表现了干预生活、触及时弊的艺术胆略。《乔厂长上任记》的出现，说明短篇小说在强调写真实、扫荡“四人帮”瞒和骗的恶劣文风的同时，没有陷入鼠目寸光的自然主义，没有丢弃革命的理想，而是追随着时代的步伐、在革命的发展中真实地反映了现实。

暴露、鞭挞林彪、“四人帮”罪恶的短篇小说也达到了新的高度。文艺是作家对现实的能动的反映，是主、客观统

一的结晶。而主观对客观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比较全面的过程。过去一年来，人们在如何认识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十年动乱和灾难，探讨这伙鬼蜮得以肆虐成灾的根源，研究如何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等方面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作家对这一问题的逐渐深刻的认识，带来了短篇小说现实主义的深化，许多优秀的短篇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控诉罪恶、抚摸伤痕的水平，力求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更深入地开掘，以鲜明的艺术形象总结着沉痛的历史教训。郑义的《枫》（《文汇报》二月十一日）和张弦的《记忆》（《人民文学》三月号）是这方面比较深沉感人的作品。《枫》艺术地再现了两派群众组织互相残杀的恶惨一幕。卢丹枫、李红钢这一对同窗学友和初恋中的情侣反目成仇、同根相煎的悲剧拨动着人们感情的琴弦。他们是在野心家们的权势角斗场上倒在血泊中的，是现代迷信的虔诚的牺牲品。《记忆》从凝聚着无数血和泪的记忆长河中提炼出一个典型的生运侧面，艺术地概括出极左路线掀起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险风恶浪铸成的两代人的悲剧。当年的宣传部长秦慕平用自己的手颠倒了放映员方丽茹纯洁美好的形象，使这朵含苞待放的生命耽误了一生中最美好的锦绣年华。然而，他自己也终于没能避免被另一些人用同样荒谬的、然而在当时却是不容反对的逻辑颠倒了。这一体现着必然的偶然把人物的命运提到了历史的和社会的高度。主人公方丽茹并不是一个消极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形象。虽然突如其来的打击曾使她痛不欲生，虽然迫害她的人必欲将她置之死地而后快，但是人民收留了她，她跨越了个人的痛苦和不幸，“没有悲伤、没有怨恨”，懂得她的遭遇并非某一个人、某一种偶然的原因所造

成，也并非她一个人所独有，“并且确信历史长河不会倒流”。

有的作品将其艺术的触角伸展到了更长远的历史过程中去，在更深广的背景上再现生活。南丁的《旗》（《奔流》一月号），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人民文学》二月号），刘真的《黑旗》（《上海文学》三月号），就是反映五八年刮浮夸风时假话成灾的社会现象。说假话升官受奖，说真话撤职挨批。这奇特而反常的社会现象是每一个“睁了眼看”的中国人都熟悉的，可是长期以来在文学作品中却得不到反映。这三篇题材相近的作品，以其具体鲜明的形象打开了人们记忆的闸门，启发读者从中汲取宝贵的教训。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雨花》七月号），跨越了新旧两个社会，历时长达四五十年，是从一个普通农民李顺大的大半生遭遇来概括一个时代农村生活的好作品。象李顺大那样一心跟党走的老实农民，为了实现盖几间房这样一个低微的生活愿望，竟然历尽艰辛、备受折磨。人物的独特经历概括了许多农民的共同命运，显示了极左路线是怎样粗暴地损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小说立意深刻，而语言朴实隽永，读来催人泪下。

人物形象的多样化是一九七九年短篇小说艺术上的重要突破。有英雄人物不平凡的业绩，也有普通人的悲欢离合。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各级干部，也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方之的《内奸》（《北京文艺》三月号）塑造了一个同情革命的正直的商人形象，填补了短篇小说人物画廊中的空白。一年来人物形象上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形象的多样化。两年前，刘心武的《班主任》塑造了两个被“四人

帮”文化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扭曲了的畸形儿的形象。去年以来,不少短篇作者开始注意发现青年心灵上的美,自觉地担负起培养青年高尚情操、用真善美来雕塑青年灵魂的任务。叶蔚林的《兰兰的木兰溪》(《人民文学》六月号)以清新、流畅的笔调,描绘了一对青年在封建思想残余的重压和禁锢下,追求真挚、纯洁的友谊和爱情的故事。孔捷生的《因为有了她》(《人民文学》十月号)用对比、映衬的方法赞美了青年女工小乔积极奋发的生活态度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茹志鹃的《草原上的小路》(《收获》三期)提出了青年的生活道路问题。采油工杨荫背着沉重的精神负担默默地工作,努力攀登科学高峰,是一个经历了痛苦的磨炼而逐渐成熟起来的青年形象。《谁生活得更美好》(《工人日报》七月十五日)和《有一个青年》(《北京文艺》一月号)中的女售票员和女大学生徐薇,属于那种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自己人格的尊严,既尊重自己又尊重别人,不怕困难、积极进取的青年形象。而顾明华和吴欢、施亚男是刚刚开始懂得应该怎样来要求自己的青年人。徐薇所说的“咬着牙赶上去”正是许多被耽误了的青年在生活起跑线上的心声。作者张洁了解和热爱青年,善于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捕捉青年心灵中积极、美好的一面,从正面引导青年奋发向上。这两篇作品是反映青年生活的佳作,很受青年们的欢迎。

这一年的短篇小说在艺术上的另一个特点是已经开始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流派。过去有山西的“山药蛋派”,那完全是中国的“土产”,有很浓的民族风味。可惜几经风吹霜打,和它的作家赵树理等一起遭逢厄运。近两年,“山药蛋派”大有重放异彩之势。《汾水》诸作家已经写出不少以写

故事见长的佳作，如马烽的《伍二四十五纪要》，潘保安的《老二黑离婚》（均见《汾水》十月号）。方之的《内奸》和河南一些作家，也比较讲究民族风格，在引人入胜的故事中写人物。王蒙、刘心武、张洁更多地借鉴了外国小说，王蒙则更为明显地表现了采外国文学良规表现中国现实的尝试。《友人和烟》（《北京文艺》九月号）向我们散开了两颗苦闷而又不甘沉沦的心，用的是西方的谈话法。《夜的眼》（《光明日报》十月二十二日）以主人公对客观事物的内心体验为轴展开情节、描绘场景，人物忽东忽西的印象、联想，和把路灯泡看做是魔鬼的眼睛等独特的内心感受，很象本世纪二十年欧美“意识流”小说。这派小说主张真实地记录人物意识流动的轨迹。《夜的眼》吸取了“意识流”的写法来反映生活的“千曲百回、时聚时离的事件的波流”，具有“意识流”的若干痕迹而又避免了其玄妙莫测的偏颇。这种在借鉴外国文学的基础上努力创新的创作实践应该受到支持与鼓励。

回顾一九七九年短篇小说的收获，我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八十年代更大的繁荣。

写于1980年初春

生 活 的 波 流

——读王蒙近作

在我国文坛上为数不多的五十年代初崭露头角、七十年代末复出的新中国第一代作家中，王蒙是以他的勇于探索而引人注目的。自去年十月《夜的眼》发表以来，他吸取西方“意识流”的某些手法以表现我国现实生活的尝试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和关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王蒙连续发表了《夜的眼》《春之声》《海的梦》《风筝飘带》四个短篇和《布礼》《蝴蝶》两个中篇^①，为我国经历了十余个严冬之后刚刚复苏的文苑增添了几朵奇异的新花。

对这些作品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现象。由于长期形成的民族的欣赏习惯和艺术趣味，人们觉得新奇、觉得乱，有的同志甚至看不懂，觉得不知所云。还有的同志对这种小说的现实主义价值有所怀疑。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更为复杂的历史的与心理的原因呢？要知道，王蒙是在刚刚冲破了“四人帮”的封建锁国政策，在他们的“彻底批判”“彻底决裂”的余音未绝之际，就把他的探索的目光，投向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某些他认为可以“拿来”与借鉴的艺术手法的。而西方现代派，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早就和资本主义制度一起腐朽堕落了，应该列为“扫荡”之首。可是，事物的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

小说已经在中、青年知识分子读者层中受到了欢迎，引起了反响。生活与实践终将批准王蒙同志借鉴外国文学之良规以表现我国现实生活的大胆尝试。我们是这种尝试的支持者，愿就《布礼》与《蝴蝶》两篇作品的艺术得失发表些看法。

—

英国十九世纪散文家和文学批评家昆西在他那篇评论莎士比亚的论文《论〈麻克佩斯〉的敲门声》中指出：文学批评应该描绘出读者对作品的印象和最直接的感情反应。读《布礼》与《蝴蝶》，最直接的印象和感觉就是它的新鲜感与现实感。它们的情节虽然简单，但跳跃性很强，忽东忽西、天南海北，上下几十年、纵横数千里；它们的章法结构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讲故事的格局，以人物的感觉、联想相贯穿；它们的人物脸上没有标鉴，也超越了通常的模式和概念，但是由于你敞开了自己心灵的窗户而很快便被你熟悉和了解。如果你想用“通过什么什么说明了什么什么”的格式来概括它们的主题思想，也会感和十分困难。但是，却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现实感，好象把五光十色的、斑驳陆离的、千曲百回的生活波流呈现在你的面前，使你觉得它们象生活一样而又比自己所感觉和认识到的生活多了点什么。它们象“意识流”小说一样写人的感觉、印象、闪念、幻想和联想，可是又没有那种扑朔迷离的、荒诞不经的、玄妙莫测的神秘感和世纪末的虚无感。透过主人公驳杂零乱的、新鲜独特的、具体细腻的对客观事物的感受，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折磨的自我感觉，你好象和主人公钟亦成、张思远一起又重新经历了一次那梦魇般

的生活，也和他们一样又重新发现了自己，并且产生了一种要紧紧抓住现在、要赶快行动的愿望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为什么写人的主观感觉、人的意识活动会获得这样的艺术效果呢？

“意识流”小说作为一种流派，于本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风行于欧美各国。“意识流”一词出自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的《论内省心理学的几个问题》和《心理学原理》。他借用“流水”来比喻人的意识流动状态，称之为“思想流、意识流或者是主观生活之流”。“意识流”小说家主张直接记录人物意识流动的轨迹，把“变化多端、无人知晓、不受限制的精神表现出来，不管它会显示出多少错乱和复杂的情况。”（伍尔夫：《论现代小说》）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它看做是一个反现实主义的颓废没落的文学流派而全盘否定，没有看到它的合理性内核。其实，人的意识，包括感性和理性的，归根到底都是客观事物和现实生活的反映。“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映象。”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因此，文学作品通过人物感觉，联想的折光，人物意识流动的辐射，也可以达到反映生活真实及具体刻画人物的效果。为什么“意识流”作为一种流派已经不再存在，可是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却仍然被政治观点、艺术见解不同的作家应用于小说、诗歌和电影呢？这恐怕是其根本原因。另外，文学是入学，写人又贵在写出人的灵魂。直接描写人的感觉、联想、内心独白、幻觉等，就

要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去，这也是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看来，问题不在于写不写人的意识，而在于写什么样的意识，在于是否把人的主观意识作为客观现实和社会生活的反映来加以表现。在这里，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是有区别的。纯粹的“意识流”小说醉心于意识的自发性、随意性，主张“作家退出小说”，所以往往陷入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泥潭。这，自然是王蒙所不取的。在《布礼》与《蝴蝶》中，作家不仅没有退出小说，而且简直可以说是与他的人物融为一体。在这里，找不到颓废没落的、虚无厌世的踪影，贯穿全篇的内在线索，与其说是主人公意识流动的轨迹，不如说是作家奔腾跳跃的感情的热流。

把人物的主观意识作为客观现实的反映来表现，是王蒙批判继承“意识流”艺术手法的一条根本经验。他并没有把人的主观意识等同于客观真实，如西方的“心理现实主义”所主张的那样，认为“真实”存在于“意识的不可分割的波动之中”。这种主张对于文学创作来说，象自然主义一样，都只占有了艺术堂奥的一半。王蒙是从主客观的统一这个辩证唯物主义的坚实阵地出发，来把握艺术创作的奥妙的。他说：“文学的真实性，既包括着对于客观外部世界的如实反映，也包括着对于人们的（包括作家自己的）内心世界的如实反映。”（《睁开眼睛面向生活》）“我们写心理、感觉、意识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它们是生活的折光，没有忘记它们的社会意义”，“我们的意识流，不是一种叫人逃避现实走向内心世界的意识流，而是一种既面向客观世界也面向主观世界，既爱生活也爱人的心灵的健康而又充实的自我感觉。”（《关于意识流的通信》）所以，在借鉴“意识流”

的某些表现手法时，他特别注意主观与客观、意识与存在的不可分离的联系，注意人物意识的形象性。

试举一例：张思远复职五年后重访当年插队落户的山村，乡亲们象亲人一样待他，拿出鲜甜的红枣让他吃。晚上，张思远做了一个梦：

晚上他和儿子，和老农睡在一起。肉、酒、喧闹、温情充塞着他的一夜。于是这一夜的梦概括着他的一生。来自他五十九年的生活经历的压缩复制。放羊娃和地主崽子打架。穿棉袍的乡村教师的垂脊。高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队伍的到来。枪林弹雨，第一枚手榴弹没有拉弦就扔了出去。红旗下举手宣誓。他不怕牺牲，他渴望献身，他深信迈过这一步便是幸福的红枣降落到每一个家庭的餐盘里。

夏天。洁白的短袖衬衫。两根宽带连结着蓝色的裙子。四五八三，她们学校的电话。拨动字盘，然后电话机里传来怯生生的声音。接电话的人不问也知道是谁打的。洁白的身影在眼前一闪。什么，她也到了山里？在哪个公社，哪个大队，哪个村子？原来那些传闻都是假的，原来你还在，你不要走，不要死，让我们再谈几句。平反昭雪的通知你怎么没拿到手？四五八三，怎么没有人接电话？咣咣，把电话机砸坏了。哭声，是我在哭么？囚徒，自由，吉姆车在王府井大街奔驰。软席卧铺车厢在京汉线上行驶。波音飞机在蓝天和白云间飞行。上面的天比宝石还蓝。枣落如雨。弹飞如雨。传单如雨。众

拳如雨。请听一听我的心脏。请给我一瓶药片。请给我打一针。是的，报告已经草拟，明天发下去征求意见。

这一段文字，几乎每一句话都是一个镜头，一幅画面。是意识，也是生活；是梦幻，也是现实。作家充分发挥了潜意识的明丽性与鲜活性，同时也考虑到它的随意性与跳跃性，用鲜明的形象在风云变幻的社会生活背景下概括出主人公的生活道路和思想历程。就人物意识的形象性这一点来看，《布礼》不如《蝴蝶》。也许是由于《布礼》的主人公钟亦成太习惯于抽象分析罢，总的来看，《布礼》在表现主人公的意识时，感性不足而抽象的思辩有余，人物形象稍嫌空泛。

二

《布礼》和《蝴蝶》均非典型的“意识流”小说，而只是吸取了“意识流”小说的一些艺术手法。正统的“意识流”小说把人物从感性到理性的各级不同水平的意识活动作为小说的直接表现对象，突破了作家以叙述人身份出面介绍描写和评议的习惯，也几乎取消了小说的情节。《布礼》与《蝴蝶》仍然有情节、有事件，也没有取消作家在作品中的作用。但是，它们仍然与我国的传统小说不同。它们究竟在哪些地方既区别于西方现代派纯粹的“意识流”小说又区别于我国的传统小说呢？

传统小说一般均以情节的发展作为结构线索，使人物思想、性格从情节的发展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这两篇小说的情节在作品中显然不起这样的作用。贯穿全篇的，不是情节的发展顺序而是主人公意识流动的轨迹。它们的结构，是

按照表现人物意识活动的需要将情节打乱重新安排的，也可以说是将情节融化在人物的意识活动及作家对人物的心理分析之中。如《布礼》在时序错综颠倒、回忆与现实相杂陈的多层次结构中，反映了三十年来历史的曲折、时代的突变，在光明与黑暗、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强烈对比中，表现了钟亦成心中扑不灭的火焰——对党对人民对革命的坚定信念。钟亦成在紧接着诬陷、棍棒、皮带的折磨与自我否定、自我批判这种精神的苦刑之后，脑海里之所以常常出现解放初期火红的年代里美好、神圣的记忆，是因为那互致布礼的年代洒在心中的阳光，正是他在灵魂与肉体的炼狱里经受住考验的精神力量。《布礼》的结构适应了表现这种意识活动的需要，在时间与空间上呈现出突兀多变、波澜起伏的状态。《蝴蝶》中包含了比《布礼》曲折动人的情节。张思远与海云的初恋、结合及离异，海云的惨死，与美兰的没有爱情的婚姻，与秋文的被控制在友谊范围内的思念，与儿子冬冬的两代人的冲突及父子真情，都是完整的生活故事。然而作家没有把它们作为结构全篇的枢纽，也没有拘泥于这些生活事件的先后顺序。单从情节的时间顺序来看，它们也有错综交叉之处，如张思远与海云的关系，在“海云”和“冬冬”等章中均反复出现；张思远七五年复职后的经历，在“复职”“上路”中也有交叉；与秋文的相识本在复职之前，但是为了服从表现人物意识流动的顺序，把它放在了“复职”之后。在时间上衔接的，只有无标题的开头与最后一章“桥梁”这两段文字，相当于全篇的“序”和“尾声”。开头从张思远坐在越野汽车上的思绪起笔，到上飞机、坐吉姆、直到回到部长楼，坐到了沙发上。从情节上看，这个开头与结尾以人物的